

# 議政視閾下的蘇門詩作考述

杜若鴻\*

**摘要：**蘇門詩人群是北宋熙豐變法的一大反對勢力，其中成員大都以詩才著稱，而又不乏政治識見。元祐更化前，蘇門詩人群或沉屈下僚，或流貶地方，他們在政治上雖然不及新黨顯赫，但從詩歌反映出來的政治內涵和數量卻大幅遠較新黨詩人群為多，對新法流弊的評議，廣泛涉及各個層面，成為他們政治詩中的一項共同特色。從文章學的角度，這構造了其詩歌寫作的重要主題，突顯出詩之論政功能的特質。其政治詩立場鮮明，元祐前多能直揭時弊、明嘲熱諷，紹聖後論政方式轉尚婉轉諷喻，藉以規避政治上的迫害。蘇門詩人群政治詩歌因為創作量多，故雖然只佔平均百分之十，絕對數卻多，這說明蘇門詩人群體不唯以唱和為樂事，重視詩歌的遊戲功能、交際功能，同時亦重視詩歌的政治功能，雖有以詩人自許、競尚文辭的一面，亦不忘實際事功，發揮詩教精神。

**關鍵詞：**蘇門詩人 蘇軾 張耒 秦觀 蘇轍 論政功能 交際功能 詩教精神

## 一. 引言

蘇門詩人群是一個既具師友紐帶，又以文事為因緣，同時政治立場具一致性的創作群，當中成員都為反對王安石推行新法的舊黨士人。這個詩人群體中，可傳者計有二十餘人，<sup>1</sup>而以蘇軾為核心人物，主要成員還有晁補之、張耒、秦觀、李廌、蘇轍等人，都可謂獨當一面的寫詩能手，政治詩的總數在北宋詩人群體中亦最為突出，即或日常交際贈和之作，也不忘以詩批評新法，關心政治。從文章學的角度，這構造了其詩歌寫作的重要主題，突顯出詩之論政功能的特質。本文考察這個群體的首要人物蘇軾，並選取其中具代表性的詩人張耒、秦觀和蘇轍等人的政治詩進行探析。

---

\* 杜若鴻，香港 香港大學 中文學院講師。

1. 秦少遊、晁無咎、張文潛、唐子西、李芳叔、趙德麟、秦少章、毛澤民、蘇養直、邢惇夫、晁以道、晁之道、李文叔、晁伯宇、馬子才、廖明略、王定國、王子立、潘大觀、潘邠老、姜君弼等。

## 二. 蘇門領袖——蘇軾的政治詩及其轉向

蘇軾於嘉祐二年（1057）進士及第。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推行新法，蘇軾因反對變法，政見不合，遂自請外任，出為杭州通判，後遷知密州（今山東省諸城市），移知徐州、湖州等地。元豐二年（1079），發生烏台詩案，蘇軾因作詩諷刺新法，結果以「譖謗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獄。哲宗即位，出知登州（今山東省蓬萊市），後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知制誥、知禮部貢舉等職。元祐四年（1089），知潁州、揚州、定州。元祐八年（1093），被貶惠州、儋州（今海南省儋縣）。建中靖國元年（1101）獲大赦，北歸途中，卒於今廣東省惠陽市常州。<sup>2</sup> 蘇軾乃舊黨的中堅人物，其一生仕途極不坦順，反對王安石變法的政治立場是一大關鍵。由於政治生涯的無定，卻促動其詩風發生變化。

### （一）攻評新法的推動者王安石

蘇軾的政治詩，緣詩人之義，以詩託諷，語言憤激犀利，詩風汪洋恣肆，具有縱橫策士之氣概。批評新法是蘇軾政治詩的突出主題，他對新法的批評往往不煩長篇累牘，揭露其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王安石雖贊同「軾才亦高」，但也指出其「所學不正」，<sup>3</sup> 認為蘇軾是其推行變法的一大阻力。

蘇軾的其中一類政治詩是攻評新法的推動者王安石。試見其〈送劉道原歸觀南康〉一詩，本為送贈之作，卻不忘對王安石進行一番嘲諷，其詩云：

晏嬰不滿六尺長，高節萬仞陵首陽。  
青衫白髮不自欺，富貴在天那得忙。  
十年閉戶樂幽獨，百金購書收散亡。  
竭來東觀弄丹墨，聊借舊史誅奸強。  
孔融不肯下曹操，汲黯本是輕張湯。  
雖無尺筆與寸刀，口吻排擊含風霜。  
自言靜中閱世俗，有似不飲觀酒狂。  
衣巾狼藉又屢舞，傍人大笑供千場。  
交朋翩翩去略盡，惟吾與子獨徯徨。<sup>4</sup>

這首詩寫於熙寧四年（1071）六月，表現出「怒鄰罵坐」的特色。徐乾學《資治通鑑後編》謂王安石執政之後，權震天下，人欲與之「條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宜復其舊，則議論自息。安石怒，變色如鐵。恕不少屈，或稠人廣坐，抗言其失，遂與之絕。」<sup>5</sup>

- 
2. 脫脫等撰：《宋史·蘇軾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31冊，卷338，頁10757-10770。又參劉尚榮（1940-）等編：《蘇軾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3. 徐乾學：《資治通鑑後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42-345冊），卷78，頁8。
  4.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1冊，卷6，頁257-260。
  5. 徐乾學：《資治通鑑後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42-345冊），卷78，頁26。

詩中所云「孔融不肯下曹操，汲黯本是輕張湯」，乃以孔融、汲黯<sup>6</sup>比劉恕，曹操、張湯<sup>7</sup>況介甫，指責王安石獨行獨斷的處事作風。其風力自健，但激訐處頗多，缺乏儒家詩教追求的溫柔敦厚。從此詩可見蘇軾在行踐政治理想時，攻訐王安石的詞鋒犀利，不留情面。

## （二）政治詩的重心：批評新法

對新法進行批評則是蘇軾政治詩的重心。其涉及層面甚廣，蘇軾甚而因詩惹禍，詳可參〈北宋重要詩案事件和詩歌轉向〉的「烏台詩案」一節。這裏再加以析論。

以用人方面為例，蘇軾反對王安石僅以「明法」取士，認為士子唯律法而廢學文辭會導致空疏之學，在〈戲子由〉一詩中，蘇軾寫出其弊端，謂「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蘇軾此詩的前半嘲謔子由，以調侃子由的口吻，把子由窮苦的生活刻劃得歷歷在目。後半書自己「餘杭別駕」以後的生活：

勸農冠蓋鬧如雲，送老齷鹽甘似蜜。  
門前萬事不掛眼，頭雖長低氣不屈。  
餘杭別駕無功勞，畫堂五丈容旛旄。  
重樓跨空雨聲遠，屋多人少風騷騷。  
平生所慚今不恥，坐對疲氓更鞭箠。  
道逢陽虎呼與言，心知其非口諾唯。  
居高志下真何益，氣節消縮今無幾。  
文章小技安足程，先生別駕舊齊名。  
如今衰老俱無用，付與時人分重輕。<sup>8</sup>

詩隱含著無可奈何之嘆，儘管自己的處境是「畫堂五丈」、「重樓跨空」，卻感到「屋多人少風騷騷」，冷清寂寞；眼見百姓受新法之害，卻「致君堯舜知無術」，無能為力。「道逢陽虎呼與言，心知其非口諾唯。」謂儘管不樂意面對營營俗吏，卻也得違反本性應酬，未能掛冠而去。此詩最終以「如今衰老俱無用，付與時人分重輕」收結，其積極入世的懷抱，剩得「居高而志下」，意志消磨。後半的自嘲和前半的嘲子由，頗有「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感慨，同時又帶有看破世事，何必計較的豁達情懷。

又見其〈和劉道原詠史〉一詩，「敢向清時怨不容，直嗟吾道與君東。坐談足使淮南懼，歸去方知冀北空。獨鶴不須驚夜旦，群鳥未可辨雌雄。廬山自古不到處，得與幽

- 
6. 汲黯，西漢濮陽（今河南省濮陽市西南）人，字長孺。漢武帝時，任東海太守，繼為主爵都尉。以直言敢諫聞名，為武帝敬重。
  7. 張湯，西漢杜陵（今陝西省西安市東南）人。漢武帝時，為官清廉，但以用法嚴酷著稱，後人常以酷吏視之。
  8.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第2冊，卷7，頁324。

人子細窮。」<sup>9</sup> 其中用事用典更耐解讀。《宋詩紀事》載：和劉道原見寄詩，意謂劉恕有學問，性正直，故作此美之。因以譏諷當今進用之人也。「敢向清時怨不容」，是時恕自館中出監稅，言非敢怨時之不容子也。馬融謂鄭康成「吾道東矣」，故以比之。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又以比恕之直也。又使韓愈云「冀北馬群遂空」，言館中無人也。嵇紹昂昂，如獨鶴在雞群；又淮南子：「雞知將旦，鶴知夜半。」又以劉恕比鶴，謂衆人為雞也。詩云：「具曰餘聖，誰知烏之雌雄。」意言當今朝廷進用之人，君子小人雜處，如烏不可辨其雌雄。<sup>10</sup>

再如對青苗法的批評，可見蘇軾關心時弊的詩作，擅於捕捉一個個現實的鏡頭說明，遠至山村的一個角落，也能看到新法弊端造成的負面影響。如〈山村〉其四：

杖藜果飯去匆匆，過眼青錢轉手空。  
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sup>11</sup>

這是針對推行青苗法之弊，蘇軾在元祐時回顧說：「官吏無狀，於給散之際，必令酒務設鼓樂倡優、或關撲賣酒牌子，農民至有徒手而歸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課暴增，此臣所親見而為流涕者也。」<sup>12</sup> 可知蘇軾批評新法的流弊有理有據，並非純粹發洩詩人囉嗦而已。

### （三）烏台之勘後由縱筆好罵而變為間接諷刺

熙寧四年（1071）至元祐元年（1086），蘇軾歷任杭、密、徐、湖、黃、汝等州的地方官，在元豐二年（1079）經烏台詩案之勘，禦史中丞舒亶等人利用其言事的職能，以蘇軾〈湖州謝上表〉及此前詩作，羅織譏謗新政的罪名把他逮捕，結果蘇軾下禦史台獄，被關一百零三日，歷經生死未卜、驚心惶惶的心路歷程。

政治生涯之驟變，並未使蘇軾從此不再談政治，不過其政治詩歌由縱筆好罵而變得較為含蓄，雖再指涉新法，所運用的方法卻以間接諷刺表達。熙寧八年（1075），蘇軾於密州時寫有〈寄劉孝叔〉<sup>13</sup> 一詩，批評方田均稅法對抑制豪強隱瞞田產的作用有限，無法真正實現富民的目標。蘇軾說「方田訟牒紛如雨」，形象地以「雨」指出了丈量土地後引發的大量訴訟案件，以當時的事實言明，語氣上不再咄咄逼人。詩的首部分諷刺神宗、王安石意欲富國強兵，可惜不得其法，結果訟案紛起，事與願違：

君王有意誅騎虜，椎破銅山鑄銅虎。  
聯翩三十七將軍，走馬西來各開府。  
南山伐木作車軸，東海取鼈漫戰鼓。

9.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第2冊，卷7，頁332-333。

10. 參厲鶚輯撰：《宋詩紀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卷21，頁517。

11.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第2冊，卷9，頁437-439。

12. 黃淮（1367-1449）：《歷代名臣奏議》（《四庫全書》，第433-442冊），卷269，頁45。

13.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第2冊，卷13，頁631。

汙流奔走誰敢後，恐乏軍興汙資斧。  
保甲連村團未遍，方田訟牒紛如雨。  
爾來手實降新書，抉剔根株窮脈縷。  
詔書惻怛信深厚，吏能淺薄空勞苦。

次以自嘲口吻，追述蘇轍因反新法被罷三司條例司，並述密州百姓以草木泥土充饑，「況復連年苦饑饉，剝齧草木啖泥土。今年雨雪頗應時，又報蝗蟲生翅膀。」生活未見改善，自己卻有心無力，間接言新法並無奏效。不過，詩中也流露出「彌弊太甚，廚傳蕭然」，乃「危邦之陋風」、而非「太平之盛觀」的保守觀點，<sup>14</sup> 蘇軾寫道：「憂來洗盞欲強醉，寂寞虛齋臥空甌。公廚十日不生煙，更望紅裙踏筵舞」，對官員利益的受損有所辯護。詩的最後一部分則以幽默的語氣，嘲笑新法中那些俗吏尸位素餐，並間接敘述自己志在天下，為自己不歸隱作解說。對於現實政治的無可為，是進或退，如何求得安心之所，則希望得到故人的指點：

故人屢寄山中信，只有當歸無別語。  
方將雀鼠偷太倉，未肯衣冠掛神武。  
吳興丈人真得道，平日立朝非小補。  
自從四方冠蓋鬧，歸作二浙湖山主。  
高蹤已自雜漁釣，大隱何曾棄簪組。  
去年相從殊未足，問道已許談其粗。  
逝將棄官往卒業，俗緣未盡那得睹。  
公家只在霅溪上，上有白雲如白羽。  
應憐進退苦皇皇，更把安心教初祖。

詩風不改其縱橫雄健，但少了前期劍拔弩張，使氣激誣的特色。雖然蘇軾向有忠直之名，但在這首詩中卻已表現出看淡功業，轉而尋求自適自足，以規避政治上的迫害。詩歌的論政方式有所改變，但蘇軾此詩仍能指出核心的問題：即方田均稅法產生訟諍不斷的流弊，使朝廷不勝其煩，導致此法最終流產。

#### （四）從好議政轉向對生命本體的思索

政治上的升沉變化，是蘇軾開始思索「仕」「隱」問題的一大促動因素，見其〈遊金山寺〉云：

我家江水初發源，宦游直送江入海。  
聞道潮頭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  
中泠南畔石盤陀，古來出沒隨濤波。  
試登絕頂望鄉國，江南江北青山多。

14. 黃淮：《歷代名臣奏議》（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33-442冊），卷30，頁31。

羈愁畏晚尋歸楫，山僧苦留看落日。  
微風萬頃靴文細，斷霞半空魚尾赤。  
是時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  
江心似有炬火明，飛焰照山棲鳥驚。  
悵然歸臥心莫識，非鬼非人竟何物。  
江山如此不歸山，江神見怪驚我頑。  
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15

熙寧四年（1071）十一月，蘇軾赴任杭州，途經鎮江金山，夜宿寺中，而作此詩。這首詩描繪了金山寺的山水名勝，企望歸隱田園，從此遠離政治漩渦，反映蘇軾對政治生涯的厭倦。政治因素對其形成有促動之功，反過來說，創作主體這種個性的形成又影響其詩作的風貌。

又見其儋州時期創作的〈別海南黎民表〉，詩云：

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遠遊。  
平生生死夢，三者無劣優。知君不再見，欲去且少留。16

當時海南的環境惡劣，蘇軾元符元年（1098）作有〈書海南風土〉一文，可窺一二：「嶺南天氣卑濕，地氣蒸溽，而海南為甚。夏秋之交，物無不腐壞者。……秋霖雨不止，顧視幃帳，有白蟻升餘，皆已腐爛，感嘆不已。」<sup>17</sup>但是，從這首詩中所見，蘇軾並不以「海南民」為恥，反而淡然自得，以變應變。可以說，蘇軾從好議政而轉向思索生命本體的轉變歷程，政治生涯的起伏發揮著直接的促動因素。

今存蘇詩2823首，政治詩佔359首，從相對值而言，僅佔百分之十三，但從絕對值而言，卻是有宋詩人中最突出的一位。其政治見解，在交際贈和之作中，佔其政治詩近一半，這種抒寫形式在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張耒、秦觀等人作品中也隨處可見，乃一種普遍的現象，說明北宋詩人在日常交際生活中也不忘政事。總體上而言，蘇軾的政治詩洋溢著激烈的政治關懷，時而嬉笑怒罵，時而明嘲熱諷，在輿論上對新法造成極大的阻力，具有一定的政治效用。這也是在法度未善、風俗未一的變法背境下，何以烏台之案以詩定讞的深層原因。

### 三. 不忘針砭的張耒詩作

蘇門詩人群的成員張耒，曾從學於蘇軾，和蘇軾交情甚篤。張耒於宋神宗熙寧六年（1073）進士及第，初任臨淮主簿。熙寧六年（1073）至元豐八年（1086），新黨得勢，張耒先後在安徽、河南等地做了十多年縣尉、縣丞的地方小官。元祐三年

15.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第2冊，卷7，頁307-308。

16. 蘇軾著，孔凡禮校點：《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6冊，卷43，頁2362-2363。

17. 蘇軾著，孔凡禮校點：《蘇軾文集》，第5冊，卷71，頁2275。

(1088)，被召回京師，任太學博士，校正秘書，入蘇軾門下。張耒份屬舊黨，在仕途上經歷起伏不平，哲宗親政後，竭力報復元祐舊臣，隨著蘇軾等人被貶，蘇門詩人大都受到株連，哲宗紹聖四年（1097），張耒謫監黃州酒稅。元符二年（1099），又改監復州酒稅。徽宗崇寧元年（1102），張耒名列元祐黨人籍，被貶為房州別駕，安置於黃州。崇寧五年（1106），宋徽宗詔除黨禁，張耒自黃州經潁州，回淮安。大觀年間，移居陳州，監南嶽廟，主管崇福宮。晚年貧病交加，卒於政和四年（1114）。<sup>18</sup> 今存張詩2167首，題材多元，政治詩佔182首。

### （一）反對變法，直揭時弊

張耒在政治觀點上追隨蘇軾，反對王安石變法，但其政治觀點較少憤激之言，比之司馬光政治上純粹的因循守舊，也是有所分別的。試見〈糴官粟有感〉一詩：

持錢糴官粟，日夕擁公門。官價雖不高，官倉常若貧。  
兼併閑困廩，一粒不肯分。伺待官粟空，騰價邀吾民。  
坐視既不可，禁之益紛紜。擾擾田畝中，果腹才幾人。  
我欲究其源，宏闊未易陳。哀哉天地間，生民常苦辛。<sup>19</sup>

此詩以生活實例陳述其政治見解，張耒指出，雖官價不高，但官倉卻常掏空乏糧；農民勤勞耕作，卻未能果腹。其原因乃在豪強兼併田地，囤積居奇，深深影響到國計民生。他常懷改革弊政，以減輕人民負擔的理想，而王安石新法中原有青苗法和方田均稅法等利民措施，照理應得到他的支援，但由於新措施實行起來流弊叢生，又因禁壓而事端紛起，致使張耒沒有盲目支持。張耒考慮的是如何真正做到改革弊政，而又不會造成社會混亂，因而指出應該探索其本，理清問題的根源。

從上述的這首詩，亦可見其憫民之情溢於言表。張耒這類詩頗多，如〈勞歌〉一詩中極力刻劃「筋骸長穀」、「半衲遮背」<sup>20</sup> 的勞動人民，他如〈和晁應之憫農〉、〈早稻〉、〈食菜〉、〈輸麥行〉等等，都體現出詩人直揭時弊的現實主義精神。

### （二）關心邊陲，懷立功之志

對於邊陲受到遼及西夏的侵擾，張耒主張積極開邊禦敵，詩中常懷立功邊疆的宏願，見〈聽客話澶淵事〉：

憶昔胡來動河朔，渡河飲馬吹胡角。  
澶淵城下冰載車，邊風蕭蕭千里餘。  
城上黃旛坐真主，夜遣六丁張猛弩。  
雷驚電發一矢飛，橫射胡酋貫車柱。

18. 脫脫等撰：《宋史·張耒傳》，第37冊，卷444，頁13113-13115。

19. 張耒著，李逸安點校：《張耒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上冊，卷10，頁161。

20. 張耒著，李逸安點校：《張耒集》，上冊，卷3，頁31。

犬羊無蹤大漠空，歸來封禪告成功。  
自是乾坤扶聖主，可能功業盡萊公。<sup>21</sup>

澶淵之盟後，宋遼雙方大致保持了百餘年的和平。王安石認為澶淵之役，「丞相萊公功第一」<sup>22</sup>，張耒則謂「可能功業盡萊公」，對於寇準（961-1023）的功勞看法大略相同。對於寇準幫助真宗的功績，張耒以強烈的口吻讚許，寄寓了詩人驅逐北寇、殺敵立功的理想和希望。類似的借詠古人以寫政治懷抱在其詩中並非孤例，他如〈張子房〉、〈齊安春謠五絕〉、〈雜詠三首〉等詩，以張良、諸葛亮、周瑜等建功立業的功績，比照自己的無成，寄寓詩人在新舊黨爭的夾縫中，儘管具有雄心壯志，也無從實現的抑鬱心境。

### （三）沉屈下僚，以山水自慰

新黨得勢之時，反對變法的蘇門詩人大都沉屈下僚，張耒先後在安徽、河南等地做了十多年縣尉、縣丞的小官，自謂「十載困微官」<sup>23</sup>，過著宦遊到處即為家的仕途生活，也以山水聊以自慰。〈赴官壽安泛汴〉云：

西來秋興日蕭條，昨夜新霜緝縕袍。  
閑遍菊花殘蕊盡，落餘寒水舊痕高。  
蕭蕭官樹皆黃葉，處處村旗有濁醪。  
老補一官西入洛，幸聞山水頗風騷。<sup>24</sup>

這是赴洛陽府任壽安縣尉途經汴河之作，張耒謂自己年齡老大，依然奔波赴任小官，本來秋興蕭索，但緣途所見殘菊、黃葉、水痕、酒旗，幸能給他一種精神慰藉，情緒難免低落，但比諸秦觀的同類詩作，已較為瀟脫。

今存張耒詩2167首，政治詩有182首，佔百分之八，其中八成集中在崇寧全面文禁以前，其政治詩的議論風格總體上比蘇軾平和，罕見如蘇詩的嬉笑怒罵。

## 四. 思想深沉的秦觀詩

蘇門詩人群的另一成員秦觀，其聲名給詞的成就所掩蓋，事實上，秦詩亦有可觀。秦觀的詩見於其《淮海集》中，現存詩有439首，創作量不算多。當中有44首政治詩。

秦觀於神宗元豐元年（1078）、元豐四年（1081）的兩次應試科舉皆名落孫山，直至神宗元豐八年（1085）才考中進士，最初任定海主簿、蔡州教授。秦觀頗得蘇軾賞

- 
21. 張耒著，李逸安點校：《張耒集》，上冊，卷15，頁252。
  22. 王安石〈澶州〉：「去都二百五十里，河流中間兩城峙，南城草草不受兵，北城樓櫓如邊城。城中老人為予語，契丹此地經鈔虜，黃屋親乘矢石間，胡馬欲踏河冰渡。大發一矢胡無酋，河冰亦破沙水流，歡盟從此至今日，丞相萊公功第一。」王安石著，李壁注，李之亮補箋：《王荊公詩注補箋》（成都：巴蜀書社，2002年），卷7，頁142。
  23. 張耒著，李逸安點校：《張耒集》，上冊，卷8，頁122。
  24. 張耒著，李逸安點校：《張耒集》，上冊，卷23，頁413。

識，政治上傾向舊黨。元祐初（1086），即由蘇軾舉薦，而擢為秘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參與編修《神宗實錄》。紹聖初年（1094），因坐元祐黨籍，受到新黨排擠，貶任杭州通判，又先後流貶處州、郴州、橫州、雷州等地，卒於藤州。

### （一）批評新法流弊

如其他蘇門詩人，批評新法的流弊亦是秦觀政治詩的主題之一，這類詩善於表現民間疾苦，內容關注現實社會問題。試見〈田居〉的其中三首，詩以360字的篇幅反復詠寫人民的生活苦況，指揭新法的不是，頗具代表性。今節錄部分如下：

#### 其一

雞號四鄰起，結束赴中原。戒婦預為黍，呼兒隨掩門。

犁鋤帶晨景，道路更笑喧。宿潦濯芒屨，野芳簪髻根。

.....

村落次第集，隔塍致寒暄。眷言月占好，努力競晨昏。

#### 其二

入夏桑柘稠，陰陰翳虛落。新麥已登場，餘蠶猶占箔。

.....

蔭樹濯涼颼，起行遺帶索。塚婦餉初還，丁男耘有託。

倒筒備青錢，鹽茗恐垂橐。明日輸絹租，鄰兒入城廓。

#### 其三

昔我蒔青秧，廉纖屬梅雨。及茲欲成穗，已復賴星暑。

遲暮易昏晨，搖落多砧杵。村迥少過從，客來旋炊黍。

.....

辛勤稼穡事，惻愴田疇語。得穀不敢儲，催科吏旁午。<sup>25</sup>

青苗法最早是參考仁宗時陝西轉運使李參在陝西發放青苗錢的經驗而成的，《陝西通志》載曰：「部多戍兵，苦食少，參審訂其闕，令民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之官，號青苗錢。」<sup>26</sup> 王安石曾在鄞縣實驗，效果不錯。青苗法自熙寧二年（1069）在河北、京東、淮南三路實行後，其他諸路也陸續推行，王安石本意為民謀利，抑制大地主放高利貸，但卻未能達到安民的目的。秦觀寫農家「雞號四鄰起」，「努力競晨昏」，辛苦勞作，血汗所得，所為只望能夠償還青苗錢的本利；但是，結果卻是「倒筒備青錢，鹽茗恐垂橐」，為了備錢償還青苗錢，連買鹽和買茶都沒了著落；

25. 秦觀著，徐培均箋注：《淮海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上冊，卷2，頁70-74。

26. 《陝西通志》（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51-556冊），卷52，頁14。

而且，還要應付苛捐雜稅，「明日輸綢租，鄰兒入城廓」，刻不容緩。百姓就算有少許餘糧，也因為官吏的催迫而掏空。這組詩以農村生活揭青苗法之弊，從行文所指涉，還隱約指涉新法的用人不當等問題。

## （二）以詩寫政治事件

在哲宗之世，秦觀因坐元祐黨籍而出為杭州通判，於途中又以「影附於軾，增損實錄」<sup>27</sup> 的罪名，貶為監處州酒稅，先後又被流放郴州、橫州、雷州等地。〈海康書事〉其一即揭示了這場政治事件：

白髮坐鈞黨，南遷海瀕洲。  
灌園以餉口，身自雜蒼頭。  
籬落秋暑中，碧花蔓牽牛。誰知把鋤人，舊日東陵侯。<sup>28</sup>

詩中的「鈞黨」用漢寧帝建寧年間「鈞黨之獄」典，<sup>29</sup> 謂相牽引為同黨，藉以影射元祐黨人所受的政治迫害。流露出國士沉屈下僚、報國無門的怨憤難平，對於新黨的指摘意在言外。

秦觀還擅長在詠物詩中運用含蓄手法寫政治事件，見其〈處州閑題〉：

清酒一杯甜似蜜，美人雙鬢黑如鵝。  
莫誇春色欺秋色，未信桃花勝菊花。<sup>30</sup>

詩的題目雖為「閑」題，但實另有所指。桃花妖艷，有如俗吏俗儒，暗指樹立元祐黨籍的小人；菊花高雅，宛如高雅士人，暗喻被擯斥於外的舊黨士人。春去秋來，菊花終要比桃花優越，人間正道總會復來，筆鋒中又見其對前路的自信，詩以詠物寫政治風波，含蓄而思深。

## （三）悲觀、低沉的詩風轉向

不過，隨著「遷臣多病」的政治情懷越來越重，秦觀的政治詩在抒情方面也越來越變得悲觀、低沉，對於世事漠不關心，不想再過問官場之事。如〈寧浦書事〉其一、其二所云：

揮汗讀書不已，人皆怪我何求。我豈更求榮達，日長聊以銷憂。  
魚稻有如淮右，溪山宛類江南。自是遷臣多病，非幹此地煙嵐。<sup>31</sup>

又如〈次韻夏侯太沖秀才〉，也表達了寄情筆墨，優遊山林的衷願，對於被投閒置散，

27. 徐乾學：《資治通鑑後編》，卷1，頁12。

28. 秦觀著，徐培均箋注：《淮海集箋注》，上冊，卷6，頁235-236。

29. 建寧二年（169），宦官侯覽指使朱並上書誣告黨人張儉與其同鄉共二十四人「相署號，共為部黨，危及社稷」，靈帝於是下詔逮捕張儉等人，指張儉等黨人相互牽引為黨。又下令緝捕鈞黨之人等百餘人，或下獄死，或流徙異地，或禁錮終身。史稱「鈞黨之獄」。

30. 秦觀著，徐培均箋注：《淮海集箋注·後集》，下冊，卷4，頁1472。

31. 秦觀著，徐培均箋注：《淮海集箋注》，上冊，卷11，頁484-485。

飽含無奈情思，詩云：

儒官飽閑散，室若僧坊靜。北窗腹便便，支枕看斗柄。  
或時得名酒，亭午猶中聖。醒來復何事，弄筆賦秋興。  
焉知懶是真，但覺貧非病。茫茫流水意，會有知音聽。  
鐘鼎與山林，人生各天性。32

馮煦評秦觀詞嘗謂：「少遊以絕生之才，早與勝流，不可一世，而一謫南荒，遽喪靈寶，故所為詞，寄慨身世，閒雅有情思，酒邊花下，一往而深，而怨悱不亂，悄乎得《小雅》之遺。」<sup>33</sup> 所論雖為詞體，然以此觀其後期詩作，亦是中肯之論。

約言之，秦觀的仕途，一如蘇軾、張耒等人，遭際坎坷，政治詩歌亦經歷由熱心議政向生命本體回歸的歷程。從中可見詩人的政治詩歌面貌，在北宋黨爭激烈的環境中所起到的變化。現存秦詩439首，當中有44首可劃分為政治詩歌，創作量不算多，但這類詩思想內涵深沉，值得格外重視。

## 五. 擅於諷喻的蘇轍詩作

蘇轍於嘉祐二年（1057）與蘇軾同登進士。對於王安石變法，他在立場上和蘇門其他詩人一致，反對新法，因而屢遭貶謫，先後出為河南推官，歷陳州教授、齊州掌書記、簽書應天府判官。元豐二年（1079）發生了烏台詩案，蘇轍亦受到蘇軾的牽連，被貶監筠州鹽酒稅。哲宗即位後，實行元祐更化，重用司馬光等舊黨大臣，蘇轍再度入京，協助廢棄新法，官至尚書右丞，門下侍郎。但於紹聖元年（1094），因新法之議忤哲宗及元豐諸臣，被貶知汝州，再謫雷州安置，後又降居許州（今河南省許昌市）。崇寧三年（1104），蘇轍在潁川定居，以讀書學禪度日，自號潁濱遺老。

### （一）關心宋室外交

宋室的外交是蘇轍政治詩的關心重點。元祐四年（1089），蘇轍以翰林學士身份奉召，作為賀遼國生辰使。<sup>34</sup> 蘇轍寫有一組〈奉使契丹〉二十八首詩，這組詩並不是純粹描寫沿途風景的山水詩，當中往往借事寫政治看法，關注維護國家尊嚴和民族領土的完整。以〈燕山〉為例：

居民異風氣，自古習耕戰。上論召公奭，禮樂比姬旦。  
次稱望諸君，術略亞孤管。子丹號無策，亦數遊俠冠。  
割棄何人斯，腥臊久不渙？哀哉漢唐餘，左衽今已半。  
玉帛非足云，子女罹蹈踐。區區用戎索，久爾靡郡縣。  
從來帝王師，要在侮亡亂。攻堅甚攻玉，乘瑕易冰泮。

32. 秦觀著，徐培均箋注：《淮海集箋注》，上冊，卷5，頁169。

33. 毛晉輯：《宋六十一家詞選·例言》（台北：文化圖書公司，1956年）。

34. 李燽：《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卷431，頁10420。

中原但常治，敵勢要自變。會當挽天河，洗此生齒萬。<sup>35</sup>

燕雲之地，乃宋室的北方屏障，北宋國運，和燕雲的割讓至關緊要。蘇轍本為出賀遼國，卻不避談宋室和遼國之間敏感的地域紛爭問題。燕山一帶，綿延百里，雄偉壯麗，本是令人心曠神怡的佳境。但詩人面對此「禮樂比姬旦」的故土，追問的卻是「割棄何人斯，腥臊久不浣」，關心的卻是「子女罹蹈踐」的一面。作為帝王之師，應抗禦外族的蹂躪，為邊防建立軍功，但蘇轍認為當時事實卻非如此，因而提出對應策略，認為只要富國強兵，敵人自會知難而退。

又〈虜帳〉一詩云：

朝廷經略窮海宇，歲遺繒絮消頑凶。  
我來致命適寒苦，積雪向日堅不融。  
聯翩歲旦有來使，屈指已復過奚封。  
禮成即日卷廬帳，釣魚射鵝滄海東。  
秋山既罷復來此，往返歲歲如旋蓬。  
彎弓射獵本天性，拱手朝會愁心胸。  
甘心五餌墮吾術，勢類畜鳥遊樊籠。  
祥符聖人會天意，至今燕趙常耕農。  
爾曹飲食自謂得，豈識圖霸先和戎。<sup>36</sup>

對於真宗與遼國簽訂城下之盟，換得短暫和平的境況，蘇轍是持讚美口吻的。他認為「朝廷經略窮海宇」，使能夠消除頑凶，功不可沒。蘇轍認為「祥符聖人會天意」，換得「至今燕趙常耕農」，以歌頌式的詩句認同真宗當時的做法，這未免褒揚太過。但蘇轍看到和戎乃圖霸的前提，參之北宋國力是較為務實的，只是末四句對統治者表現出的情感令人懷疑這首詩的歌功頌德成分。

## （二）諷喻君臣好大喜功

相比於晚期的詩作，蘇轍政治詩的諷喻內涵就更為深刻。〈八璽〉是一首典型的作品：

秦人一璽十五城，百二十城當八璽。  
元日臨軒組綏新，君臣相顧無窮喜。  
九鼎崢嶸夏禹餘，八璽錯落古所無。  
古人鄙陋今人笑，父老不慣空驚呼。<sup>37</sup>

璽乃皇權的象徵，宋代立國以來，計有六璽，哲宗時得一枚秦璽，徽宗即位後，又

35. 蘇轍著，曾棗莊點校：《三蘇全書·蘇轍集》（北京：語文出版社，2001年），第16冊，卷16，頁405。

36. 蘇轍著，曾棗莊點校：《三蘇全書·蘇轍集》，第16冊，卷16，頁408。

37. 蘇轍著，曾棗莊點校：《三蘇全書·蘇轍集》，第16冊，卷21，頁516。

得一枚，故共有八璽。這首詩表面上似是描寫太平盛世的歡樂，實質上是諷刺徽宗和蔡京一黨的窮奢極侈。《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大觀元年（1107）十一月壬戌紀事載「八寶既成，夐無前比，殆天所授，非人能為。」<sup>38</sup>《宋史全文》亦載，蔡京賀「有鵠約數萬隻盤旋雲霄之上」、「汝州牛生麒麟」<sup>39</sup>符瑞的出現，盡歸於徽宗之聖明，歌功頌德。此詩寫君臣一唱一和，其樂無窮。看來徽宗可比夏禹，八寶可和夏禹所鑄的九鼎媲美，繼古開來。但是，蘇轍筆鋒一轉，說民間百姓並不以為然，這樣荒誕的想法只會令人發笑，言外之意，百姓並非盲目地附和，如果統治者只懂好大喜功、驕奢淫逸，未能把國家治理好，並不會受到百姓擁戴。

### （三）批評蔡京新法

崇寧元年（1102），蔡京當權，他仿「制置三司條例司」置「講議司」，謀劃專司主持變法事宜，《宋史·徽宗一》記載：「是歲，京畿、京東、河北、淮南蝗。江、浙、熙、河、漳、泉、潭、衡、郴州、興化軍旱。辰、沅州猺入寇。出宮女七十六人。」<sup>40</sup>蘇轍寫有〈十一月十三日雪〉以述當時災情，直指新法的誤民，不合天意民心，詩謂：「我田在城西，禾麥敢嫌薄。今年陳宋災，水旱更為虐。閉籬斯不仁，逐熟自難卻。饑寒雖吾患，尚可省鹽酪。」<sup>41</sup>寫地方官以「糴」的方法，收購糧食囤積居奇，抬高糧價。蘇轍此詩針對現實情景，有的放矢。此時變法之爭實質上已非為國事而爭，成為當權者排斥異己的意氣之爭，蘇轍此詩，敢於在此嚴峻的政治背景下寫成，其意義值得格外注意。

蘇轍的〈丙戌十月二十三日大雪〉，也是批評蔡京推行新法的力作：

誰言豐年中，遭此大泉（錢）厄。肉好雖甚精，十百非其實。  
田家有餘糧，斬斬未肯出。閭閻但坐視，潛潛不得食。  
朝饑願充腸，三五本自足。飽食就茗飲，竟亦安用十。  
奸豪得巧便，輕重竊相易。鄰邦谷如土，胡越兩不及。  
閑民本無賴，翩然去井邑。土著坐受窮，忍饑待捐瘠。<sup>42</sup>

大錢法始於王安石變法的當二錢，崇寧二年（1103），蔡京鑄當十大錢及當五夾錫錢，大錢相對小平錢而言，面值雖大，但實際的重量卻小，造成面值和實值不相稱，於是民間「盜鑄」問題嚴重，不法之人私下熔毀小平錢，輕重相易，改鑄大錢，從中圖利。這樣造成大錢在實際運用上不斷貶值。官方鑄錢雖然首次能保證其合乎面值的購買力，然而種糧換錢的農民卻招致無理的損失，於是儲糧棄錢的情況普遍，直接造成饑荒流行，

38. 黃以周等輯注：《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卷27，頁926。

39. (元)佚名撰：《宋史全文》（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30-331冊），卷14，頁49。

40. 脫脫等撰：《宋史·徽宗一》，第2冊，卷19，頁366。

41. 蘇轍著，曾棗莊點校：《三蘇全書·蘇轍集》，第16冊，卷19，頁461。

42. 蘇轍著，曾棗莊點校：《三蘇全書·蘇轍集》，第16冊，卷21，頁499。

民生問題叢生。《宋史》謂崇寧五年（1106）是較為清靜的一年，沒有巨大的天災，可稱豐年。蘇轍卻以眼前所見入詩，令人對《宋史》所載產生懷疑。這裏亦充分體現出蘇轍審視政治問題的慧眼。崇寧元年（1102），蘇轍被列入元祐黨籍，但從其作品中仍可找到類似〈丙戌十月二十三日大雪〉這樣的作品，表現其依然熱心議政的心境。當然從數量上而言，不得不指出，如〈次遲韻千葉牡丹二首〉和〈歲莫口號二絕〉這類表達政治風波後個人無奈之情的詩作所佔比例要遠為突出。

蘇轍今存詩1826首，政治題材的詩歌佔165首，佔百分之九。在蘇門詩人群中亦是較為突出的一位。其詩除了善用諷喻外，也能直指時弊，晚年詩作仍間有用力批評新法之作，儘管此時變法之爭已淪為黨同伐異的政治鬥爭，蘇轍詩所發揮的政治效用實質上有限，依然可從中看到崇寧以後北宋個別詩人政治關懷的一個側影。

## 六. 結 語

蘇門詩人群是北宋熙豐變法的一大反對勢力，其中成員大都以詩才著稱，而又不乏政治識見。元祐更化前，蘇門詩人群或沉屈下僚，或流貶地方，他們在政治上雖然不及新黨顯赫，但從詩歌反映出來的政治內涵和數量卻大幅遠較新黨詩人群為多，對新法流弊的評議，廣泛涉及各個層面，成為他們政治詩中的一項共同特色。總體風格方面，其政治詩立場鮮明，元祐前多能直揭時弊、明嘲熱諷，紹聖後論政方式轉尚婉轉諷喻，藉以規避政治上的迫害。

蘇門詩人群政治詩以蘇軾最突出，今存蘇詩2823首，政治詩所佔比例359首，從相對值而言，佔百分之十三，但從絕對值而言，是有宋詩人中最為突出的一位。其政治見解，在交際贈和之作中，所佔比例近一半，這種抒寫形式在張耒、秦觀作品中也隨處可見，乃一種普遍的現象，尤其是蘇門詩人群更突出，說明北宋詩人在日常交際生活中也不忘政事。張耒詩佔2167首，政治詩佔182首，佔百分之八，其政治詩風格總體上比蘇軾更為平和，罕見如蘇詩的嬉笑怒罵。現存秦詩439首，當中有44首政治詩，創作量不算多，但這類詩思想情感深沉，尤其是紹聖之後，秦觀因坐元祐黨籍，以「影附於軾，增損實錄」被治罪，備受打擊，此特色益明顯。蘇轍今存詩1826首，政治詩佔165首，佔百分之九，崇寧文禁後仍間有批評新法之力作。但是，如張耒、蘇轍和其他經歷崇寧全面文禁後尚在世的舊黨詩人，論政詩的創作量寥寥可數，抒寫個人貶謫情懷則明顯增多。

總的來說，蘇門詩人群政治詩歌要比同時期的新黨詩人群或其他時期的詩人群體突出，因為創作量多，故雖然只佔平均百分之十，絕對數卻多，這說明蘇門詩人群體不唯以唱和為樂事，重視詩歌的遊戲功能、交際功能，同時亦重視詩歌的政治功能，雖有以詩人自許，競尚文辭的一面，亦不忘實際事功，發揮詩教精神。 □

（本文據哲學博士論文修訂，發表於中國文章學國際學術研討會。）